

司马迁文艺思想简论

吴象枢

(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司马迁散见于《史记》诸篇的文学主张,可说是“成一家之言”。他的“发愤著书”说,他的“溯流别”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溯流别

如果说司马迁的文艺思想,那最基本的要算“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再就是他的“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系统阐述自己文艺思想的专篇,司马迁的文艺思想和文学主张主要见于他写给朋友任安的回信《报任安书》和《史记》中的《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自序》同时还有散见于《史记》其他篇章的章节和片断:如《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庄子部分,《伯夷列传》的序论部分,《儒林列传》的序论部分等。司马迁的文艺思想深受儒家的影响,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文学思想,“质”“文”并重,一方面非常重视文学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也十分强调文学作品的艺术性。

一 文学本质观

司马迁及他的《史记》文艺思想,可以首先从他对文学概念的认识说起。

司马迁在《史记》中 38 次使用“文学”一词,但其含义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司马迁眼中的文学具有一种广义的文化内涵,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指儒学而言。《儒林列传》这样提到“文学”一词:“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1]317}这句话中的“文学”一词,如果联系前面的内容来看,“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刘邦围鲁时,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说明儒学教化影响人心之深广,已经成为一种风俗。同时,孔子的话证明鲁地儒

生很早就有“文学”的传统,而且“斐然成章”。在朱熹的《四书集注·论语·公冶长》中对“斐然成章”注释说:“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观者。”由此看来,“文学”含义虽然与儒学有密切联系,是指学术、学问,但从“斐然成章”来说,也开始有现代的文学含义。

而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司马迁则用“文”、“辞”或“文章”表示。如:“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三王世家》)^{[1]214}“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屈原贾生列传》)^{[1]249}“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儒林列传》)^{[1]319}

司马迁用“文学”、“文章”等不同的术语来分别指称学术与文学,说明他已注意到文学和学术的区别,具有一定的文学自觉意识,同时也是司马迁重视文学的一种表现。正因司马迁重视文学,他才会为文学作家立传,并用大量篇幅录载那些有感情、有文采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很重视文体。“十表”是对史文的重视,《史记》本身就是属于历史的体裁,《史记》“十表”是司马迁欲创《春秋》第二的直接表征。^[2]《屈原贾生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对“赋”文体有充分的认识。《史记》所提到的各种外交文书包括奏章,也同样是文体,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就有“檄”的称谓。对于诗的认识,像

*收稿日期: 2008-11-05

作者简介: 吴象枢,男,湖南涟源人,湖南省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文艺与传媒。

《项羽歌》《大风歌》《戚姬歌》《瓠子诗》等。对于书评的认识,《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庄子部分就是一篇书评。特别是对“寓言”文体的认识,寓言可以说是由于司马迁《史记》而扩大影响的。《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庄子部分中说:“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箝》,以诋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1]2143-2144}《庄子·寓言》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3]这里没有按等级来划分,而是对全书所做的一种评估。重言、卮言、寓言,只有寓言才最具有独立和完整的话语叙事形式。“寓言十九,借外论之”,^[3]司马贞《索引》云:“其书十余万言,率皆立主客,使之对话,故云‘偶言’,又音寓,寄也。”^{[1]2143}陈蒲清说:“‘寓言’这个名称,在我国最早见于《庄子》……(寓言、卮言、重言)三者的共同点都是把自己的主旨寄托在其他人或事上,但‘寓言’一词更为恰切地反映了主旨和故事的寄寓关系,因而后来被广泛采用了。”^{[4]6}可以说,《庄子》“寓言”是其价值和特色,自司马迁《史记》而扩大影响,也是司马迁评价庄子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

司马迁很重视对文章风格的认识。司马迁评司马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1]3073}评骀子“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1]2344}评三王“文辞烂然”,等等。司马迁已经很重视对文章风格的欣赏,他自己在《报任安书》中也主张“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司马迁重视文艺的虚构和想象。这也体现在对于《子虚赋》的评价上,司马迁说:“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1]3002}在此,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想象和虚构的认识。

对于文学形象问题,司马迁也有自己的见解。在《鲁仲连邹阳列传》中有谓“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屈原贾生列传》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迥而见义远”,都含有“指事类情”的意思。

司马迁相当重视个人或作家的主体特征。如《屈原贾生列传》中对屈原的评价:“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誉,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

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絮,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迥而见义远。其志絮,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2482}是对屈原作者意识的强调和对其情感功能的认识。再如《平原君虞卿列传》说“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1]2376}也是对个人主体特征的认识。从《太史公自序》中“发愤著书”来看,司马迁也是相当重视个人或作家的主体特征。

二 “发愤著书”说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戾,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1]2482}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司马迁的“愤”即“怨愤”,“怨”字来自孔子在《论语·阳货》篇里提出的“兴观群怨”的观点,其中“怨”是指文学作品可以对不良政治的种种表现表示出否定性的情感态度。在《史记》中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强调文学作品是“愤”的产物,同时也强调文学作品要有“愤刺”的作用。

为什么会发愤著书呢?司马迁认为:“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1]2482}人在“劳苦倦极”、“疾痛惨怛”之时,需要渲泻怨愤,著书是渲泻的最好方式。司马迁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1]2482}屈原的“怨”天经地义,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处以腐刑,蒙受奇耻大辱,司马迁为自己强调文学的“怨愤”找到了合理的依据。正因为如此,他称赞“盖自怨生”的《离骚》“其志洁,其行廉”,“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司马迁因蒙受奇耻大辱后,而“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他对此有切肤之痛,故在《史记》中常常以极大的悲愤对当时的世态炎凉予以强烈的“愤刺”。在《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随着魏其侯、武安侯地位的不断变化,诸游士、宾客、诸侯时而“争归魏其侯”,时而“皆去魏其归武安”。在这一篇传记中,写这些人物的趋炎附势,前后竟达七次之多。作者如此大肆渲染,正是为着怨刺世态炎凉、针砭时弊。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所表现的“愤刺”是多方面的,除了对世态炎凉,他还

对汉武帝的严刑酷罚,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天道观进行了“愤刺”,还对武帝的信奉神仙、用人不公、刻薄寡恩、奢侈无度等多方面进行了“愤刺”。

“发愤著书”说与“诗言志”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太史公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这明显是对“诗言志”思想的发挥。《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庄子部分中,司马迁将庄子和庄子文艺提到了一个高度上去认识,篇中所言“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既是对其哲理的揭示,也反映了他的“诗言志”的思想。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东汉桓谭《新论》所谓“贾谊不左迁矢志,则文采不发”;唐代李白提出“哀怨起骚人”,韩愈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及其《送孟东野序》所谓“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宋代欧阳修所谓“穷者之言易工也”、“愈穷则愈工”、“诗穷而后工”,这都是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脉相承的。

三 “溯流别”思想

司马迁的《史记》无论从体例建构,还是史料的选择,人物的塑造都可以说是“成一家之言”。《史记》的本纪、世家、书、表、列传五体为司马迁所创造,当然他的创造中有对前人借鉴。《太史公自序》中曾反复申说《史记》是效《春秋》而作,《春秋》的经传形式对《史记》体例的创造影响很大,《吕氏春秋》一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这一形式也给司马迁以很大的启示。但是司马迁的创造不宗一书,不效一体,而是参酌各种典籍体例的长短,匠心独运汇入一编,创造出新体例,自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的一家之言的文艺思想,除了上述说的“发愤著书”说以外,还有一些思想也值得我们去考究。比如说“溯流别”或“溯源流”的文艺思想,其实在《史记》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一般认为,“溯流别”的思想,是钟嵘《诗品》的文艺批评方法,“溯流别”将汉魏至齐梁的诗人归于《诗经》楚辞两大系统,比较科学地概括了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思潮的发展历史。

在《史记》中,这种溯源流的形式是比较普遍的。如司马迁对自己的《易》学渊源,进行了溯源,上溯到孔子。《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短矧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

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儒林列传》说:“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受《易》于杨何。”无论按哪种说法,司马迁都把他的《易》学渊源溯到了孔子。这就是典型的溯源流的例子。

除了在考究《易》学的渊源上体现了司马迁的“溯流别”思想,在进行文艺评论时,司马迁其实也同样有“溯流别”思想。《孟子荀卿列传》说:“孟轲,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后有骹子之属。”^{[1]2343}在《十二诸侯年表》中我们也能看到:“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同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1]509-510}这显然是对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进行溯源。可见,司马迁总是将源流问题放在首位,这是史家写史的自觉性体现。史作为时间叙事的载体,从源流上探讨这是史家惯用的方法。章学诚说:“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5]323}这虽不是说司马迁,但司马迁这种思想对历史和文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特别在《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庄子部分,“溯流别”思想更是明显。刘勰所谓“原始以要终”的文论话语来自于《周易·系辞下传》但具有实质性的学术和文化规范则始于司马迁的《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庄子篇。在司马迁之前,学术史的写作有《庄子·天下》《荀子·解蔽》和《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然而荀子和韩非都是就现实的斗

争而言的,可以说以往没有出现一种规范性的语言来揭示学术的承继关系,也没有出现自觉的学术史意识。《庄子·天下》的论述中有意将学术与现实进行区分,但是仍然处于一种对理论现象的列举中,没有学术归属的观念。因此,正式开始学术史的写作应从司马迁开始。正是基于对学术史的认识,司马迁有了“溯流别”的思想。他说:“庄子者,宋人也,名周。周尝为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1]2147}司马迁把庄子的“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司马迁还说:“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1]2143-2144}这显然是把老子之术与孔子之言流别开来。

司马迁这种“溯流别”思想,后来为班固继承,《汉书·艺文志》中对九家十流分类的源流问题的探讨,术语和形式都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在文学上郑玄的《诗谱序》开诗文之风,但受史的方法影响,再往后推钟嵘的《诗品》才真正具备了后世诗文的溯流别方法论思想。总之,《史记》所具有的“溯流别”文艺思想具有开创性。

司马迁在《天官书》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在他看来,五百年前出了个孔子,在他这个时代,“大变”的时候到了。他认为自当继续先父的志业,挑起五百年来重建史记这一划时代的重任,于是他努力著书来实现宏愿。孔子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想效仿孔子,也就在各方面有“一家

之言”的论述。在文学方面,司马迁直接赞颂具有艺术美的文学作品,重视为讲究艺术美的文学家立传,在《史记》中他大量收入具有艺术美的作品,同时他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也非常重视作品的艺术美。司马迁自觉认识到文学源于生活。他在《史记》的《儒林列传》《太史公自序》和《屈原贾生列传》中谈论孔子编列《诗》《书》,修定礼乐,撰写《春秋》的情况以及其他人的历史,回顾自己以亲身体验和社会考察为基础的创作过程,认为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自己和杰出的历史人物都是为反映现实、表达个人的志向与感慨而写作的。他特别强调的“发愤著书”说,实际上道出了文学源于生活的真谛。当然,司马迁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描述这一切的。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82
- [2] 吴象枢. 《史记》“十表”是司马迁欲创《春秋》第二的直接表征[J]. 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4).
- [3]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 [4] 陈蒲清. 中国古代寓言史[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3
- [5] 章学诚. 文史通义·诗话[M] / 廓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责任编辑:黄声波)